

阙里孔庙建筑修建史札^{*}

王贵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A History of Confucius Temple Constru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Queli of Qufu

Wang Guixiang

摘要: 曲阜阙里孔庙的修建,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虽屡经周折,却在同一个基址上不断地扩展并完善着同一个建筑组群。本文从曲阜阙里孔庙在先秦至汉代时的初建,到唐宋时期的增扩,再到元明时代的定型,及现存清代阙里孔庙的格局,做了一个纵贯两千多年的梳理。曲阜阙里孔庙在逐渐扩大的过程中,有过多次的重建、扩建,在规模上大致形成规模是在金代,而在型制上则自元、明时代趋于定型,现在的格局则是在清雍正年间重建中确定的。因而,曲阜阙里孔庙的修建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中国古代建筑衍生演变的鲜活图卷。

关键词: 阙里孔庙,修建,增扩,定型

Abstract: It i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to build and rebuild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Queli of Qufu, Shandong province. And it is a building complex to be enlarged and to be consummated again and again. It has concern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building in the time befor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early enlarge construction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n from the early style establish to the finalizing design of the building complex. It had been enlarged and rebuilt time to time and formed the final plan and style 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existing building are mainly rebuilt in the year of Yongzheng of Qing dynasty. We could probably see a vigorous picture of constructive history of a typical Chinese traditional building complex.

Key Words: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Queli, construction, enlargement, finalize the design

关于曲阜阙里孔庙建筑,最早而系统的研究成果是梁思成先生于1935年发表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的上篇《孔庙建筑之研究》。^①在文章一开篇,梁先生就谈到:“由建筑史研究的立场上着眼,曲阜孔庙的建筑,实在是一处最有趣的,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孤例。以一处建筑物,在两千年之久的期间,由三间私人的居室,成为国家修建,帝王瞻拜的三百余间大庙宇;且每次重要的修葺,差不多都有可考的记录。姑不论现存的孔庙与最初的孔子庙有何关系,单就两千年来的历史讲,已是充满了无穷的趣味。”^②梁思成先生的这篇大论,是关于孔庙建筑修葺方面问题之探讨,其中的主要篇幅是在提出诸多古建筑维修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由于论文的主旨在于建筑之修葺,有关孔庙建筑之历史的研究,仅限于上篇中的第一章“孔庙建筑史略”部分,是一个十分简要的概略性描述。限于篇幅,梁思成先生还未及将“充满了无穷的趣味”的孔庙建筑历史做更为详细的论述。

孔庙,又称“夫子庙”,在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曾称为“文宣王庙”,或简称“文宣庙”、“宣圣庙”、“先圣庙”、“先师庙”等。而一些由地方兴建的孔庙,又称为“文庙”。孔庙建筑的历史有三个特点:一是,一座建筑,在同一地点,反复地重建,并不断地增扩为一个大的建筑群,时间长达两千多年之久;二是,同一名称与内容的建筑,在自唐以来的一千多年历史上,在中国的京城,及各个州、县,曾经普遍地建立,并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反复

^{*} 本文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合院建筑尺度与古代宅田制度关系以及对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市街坊空间影响研究”,编号为50378046。
^①原文刊载于1935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文章先后收入《梁思成文集》,第二卷,与《梁思成全集》,第三卷。

^②《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上篇,第一章,见:文献[3],第三卷:51

地加以修葺或重建；三是，历代京城与地方孔庙建筑，往往与当地最高的教育建筑——“学”（太学、国子监、州学、县学等）同时且并列地建造，有时甚至有“庙”与“学”合一的倾向。

一 阙里孔庙建筑之滥觞

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故于春秋时鲁哀公十六年（时 73 岁），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 479 年。孔子身后留有两处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一是其冢，一是其宅。据《史记》：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①

孔子冢成为弟子及鲁人相守追思的地点，其众弟子曾守冢 3 年，弟子子赣曾结庐冢上，而在其冢旁结室而居者，有 100 余家，形成一个居住的里邑——孔里。孔子冢占地的规模有一顷之多，其冢茔前成为鲁人每年奉祠礼拜的场所，孔子之后的儒生，也于其冢前举行“讲礼、乡饮、大射”的礼仪。然而，最初其冢前只有一个 6 尺见方的砖筑坛台，并无专门用于祭祀的祠堂建筑。^②这座有一顷之地的孔子冢，就是后世孔林的雏形。

至于孔子生前的居所，《史记·孔子世家》中并没有做任何详细的交代，在后世注疏的《三家注史记》中引《括地志》所云：“兖州曲阜县鲁城西南三里有阙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庙。”^③而《史记》中仅仅提到孔子的“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关于这句话的句读，这里有一些不同见解^④，以笔者之愚见，“故所”者，孔子的故宅也；“居堂”者，宅中的堂舍也。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孔子的后世弟子中，有人以孔子的“故所居堂”而为祠庙，收藏孔子生前的衣、冠、琴、车、书等物，作为纪念与礼拜的对象。至少在汉初时，路过鲁地的汉高祖刘邦就曾以最高的礼仪——“太牢”为孔子进行了祭祀活动。历来的诸侯、卿相，来到鲁这个地方，首先要做的事情，也是谒拜孔子的祠庙，然后才开始日常的理政工作。汉高祖时，距孔子没世约 270 多年。说明在汉以前，对孔子的祭祀并没有中断，但祭祀的地点恐怕仅仅是因以为庙的孔子故宅。关于这一时期孔子宅或孔子祠庙的情况，史料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信息。

自汉高祖以太牢之礼祠孔子之后，西汉与东汉数百年间，围绕孔子的住宅或祠庙并没有多少建设活动，却发生了一件当时贵胄侵吞孔子宅地的事件，这就是西汉武帝时代的鲁恭王，为扩展自己的宫室，而坏孔子宅之史事。事见于《汉书》：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⑤

鲁共王，即鲁恭王，东晋袁安的《后汉纪》与唐人房玄龄的《晋书》中，均载此事，如《后汉纪》卷 12 载：“武帝世，鲁恭王坏孔子宅，欲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论语》、《孝经》，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入其宅，闻琴瑟钟磬之音，瞿然而止。”^⑥《晋书》，卷 36 载：“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

●文献[4]，卷 48，孔子世家：406

●文献[5]，卷 47，“孔子世家”：876，“集解皇览”：“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瓠瓠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

●文献[5]：848

●据《三家注史记》疏中引“索隐”谓“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没后，后代因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寿堂中。”梁思成先生直引其句，并没有做解释，而新版《梁思成全集》有今人在此句下所加注曰：“‘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断句错误，同时‘弟子’为‘第’之讹，即原句应为‘故所居堂第之内，后世因庙……’”。但将原文中“弟子”改为“第”仅为猜测，若以此为据而认为梁先生断句错误，恐过于武断，故存疑。

●文献[6]，卷 30，艺文志：409

●文献[7]，史部，编年类，《后汉记》，卷 12

汉世秘藏希得见之。”^①鲁恭王是汉景帝的儿子，好治宫室，曾因春秋时鲁僖公的基兆而营造灵光殿。^②鲁灵光殿以汉时人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而闻名于史。据赋中的描述，这座殿堂建筑，前有朱阙双立，高门耸如闾阖，门宽可行二轨，殿堂前有泰阶，殿内旋室窈窕，洞房幽邃，殿前西厢踟蹰，东序重深，离楼高起，三间四表，八维九隅，无论是空间，还是结构都十分复杂。^③从鲁恭王欲广其宫而坏孔子宅，说明鲁灵光殿与孔子宅之间的距离并不很远。据北魏酈道元的记载：“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④，即灵光之南阙，北百余步即灵光殿基，东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余。东西廊庑别舍，中间方七百余步。阙之东北有浴池，方四十许步。池中有钓台，方十步，池台之基岸悉石也。遗基尚整，故王延寿《赋》曰：周行数里，仰不见日者也。”^⑤由此可知，北魏时尚完整保留遗基的鲁灵光殿，规模是相当大的，其位置就在孔子宅东南方向侧近处。鲁恭王因其在孔子宅中遇到的神奇之事，感到了恐惧，而中止了对孔子宅的破坏，但其最初坏宅破壁的举动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使得《古文尚书》等重要典籍得以重见天日，极大地影响了汉以后的文化发展。

鲁恭王的这一粗鲁做法，从侧面说明了在汉代时的孔子故乡，还没有具有强烈礼仪性的孔子庙堂。人们进行礼祀的空间，仍是孔子的故宅。然而，孔子故宅的规模有多大呢？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在谈到鲁恭王坏孔子宅之事时，提到了一点有关孔子故宅的情况：“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之，希有见者。于时闻堂上有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颜母在中间南向。夫人隔东一间东向。夫人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时物也。”^⑥说明在汉代时，甚或北魏时，尚存的孔子故宅仅为一座三开间的屋舍。但是，在酈道元的描述中，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据《水经注》：曲阜有周公台，“台南四里许则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⑦这里所说的“宅大一顷”与前面所引之“庙屋三间”，显然是不相符的。一顷之地，有百亩之多，何以其主要的“庙屋”仅有三间，令孔子及其母亲、夫人，屈尊拥挤在一起呢？联想《汉书》中“孔子冢大一顷”的记载，则酈道元的“宅大一顷”，很可能是将汉时人“冢大一顷”的记载弄混淆了。

既然“宅大一顷”不大可能是汉魏间孔子故宅的真实情况，那么，究竟孔子的故宅可能会是多大规模呢？我们不妨从孔子“儒有一亩之宫”的说法中加以探讨。由《礼记》中鲁哀公问于孔子“儒行”之事中，透露了孔子关于其居处之所的点滴看法。其一，“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溇，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⑧其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箝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⑨此外，史书上经常引用的孔子有关宫室建筑的一段话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⑩如果说孔子“卑宫室”的思想，更多的是就帝王、诸侯的宫殿建筑而言的，那么，“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箝门圭窬”，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春秋时一般儒生居所的一个描述；而“其居处不淫”，则是对这种简陋居所的一种精神层面的解释。

孔子“儒行”中还特别谈到了“儒有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櫓”。^⑪既然孔子如此重视忠信，他又怎么可能自己居有百亩之大的宅舍，而对鲁哀公侈谈“儒有一亩之宫”、“居处不淫”呢？由此可知，孔子生前的住宅，恐怕也不会比“一亩之宫，环堵之室”大多少。孔颖达在《礼记正义》疏中特别对“一亩之宫”做了解释：“‘儒有一亩之宫’者，一亩，谓径

①文献[8]，卷36

②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35：“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

③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35

④文献[9]，卷25：1608，其疏按：“《阙里文献考》谓古阙里以双石阙得名。”

⑤文献[9]，卷25：343。以北魏时一步为6尺计，殿基东西40步（24丈），南北20步（12丈），灵光殿基址面积3亩余，殿前有东西廊庑及别舍，但所谓“中间方700余步”，不知是指庭院之南北长度，还是东西宽度，抑或是面积数？以其基“周行数里”推知，整座建筑群的周边当有数里之长，则其边长至少在1里，即300步，而其基址面积不会少于数百亩。

⑥文献[9]：342

⑦文献[9]：342

⑧文献[10]，卷59，儒行第四十一：1862

⑨文献[10]，卷59，儒行第四十一：1863

⑩文献[11]，子罕篇第九：16

⑪文献[9]：342

- 文献[9]: 342
 ●文献[11], 雍也篇第六: 10
 ●文献[12], 卷 19: 370
 ●文献[7], 史部, 地理类, 都会郡县之属, 《山东通志》, 卷十一之三, “阙里志三”
 ●文献[7], 卷十一之四
 ●文献[6], 卷 1 下, 高帝纪下: 24
 ●文献[6], 卷 67, 杨胡朱梅云传: 837
 ●文献[7], 史部, 地理类, 都会郡县之属, 《山东通志》, 卷十一之七, “汉梅福请封孔子后书。”
 ●文献[7], 史部, 地理类, 都会郡县之属, 《山东通志》, 卷十一之七, “汉梅福请封孔子后书。”
 ●文献[7], 《前汉书》卷 56, 董仲舒传: 707, “孔子作《春秋》, 先正王而系万事, 见素王之文焉。”
 ●文献[7], 《前汉书》卷 12, 平帝纪: 113。事另见文献[7], 《后汉书》, 卷 79 上: 931; 儒林列传第六十, “初, 平帝时王莽秉政, 乃封孔子后均为褒成侯, 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
 ●文献[7], 《后汉书》, 卷 1 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14
 ●文献[7], 《后汉书》, 卷 1 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20
 ●文献[7], 经部, 礼类, 通礼之属, 《五礼通考》, 卷 121, 引《册府元龟》。事另见文献[7], 《后汉书》卷 79 上, 儒林列传第六十: “元和二年春, 帝东巡狩, 还过鲁, 幸阙里, 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作六代之乐, 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 命儒者讲《论语》。”: 930
 ●据《后汉书》卷 20 所载, 汉明帝永平 12 年(69 年), 帝“东巡狩, 过鲁, 坐孔子讲堂, 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 ‘此太仆之室。太仆, 吾之御梅也。’”276。另据《后汉书》卷 29 载: 371 载, 东汉光武初, 鲍永曾为鲁郡太守, 时“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 从讲堂至于里门。”
 ●文献[7], 《后汉书》, 卷 3,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51
 ●文献[13], 卷 16, 魏书十六, 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 423
 ●文献[7], 《后汉书》, 卷 5, 孝安帝纪第五: 83

一步, 长百步为亩。若折而方之, 则东西南北各十步为宅也。墙方六丈, 故云‘一亩之宫’。”^①唐以前以一步为 6 尺, 则 10 步为 6 丈。因此, “一亩之宫”就是一座 6 丈见方的小院落。中间仅能布置一座三开间的居舍而已。而这与郾道元所记“庙屋三间”的情况正好相合。另外, 从《论语》中“伯牛有疾, 子问之, 自牖执其手”^②, 可知当时儒者的居舍十分低矮简陋, 可以隔着窗牖而执其手。其弟子的居处如此, 孔子自己的住宅, 也不会十分修大的。

据后人的推证, “曲阜庙创于鲁哀公十七年。”^③即公元前 478 年, 这是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其依据是什么? 最初的庙究竟有多大规模? 最初的孔庙与孔子故宅是分离的, 还是合一的? 这些我们都无从知道。但早期文献中, 却并没有十分肯定的有关孔庙初创之记载。仅在清代人编纂的《山东通志》中有“周敬王四十二年鲁哀公诛孔子曰尼父(哀公十七年), 立庙于旧宅, 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④因没有详细的考证, 似不能作为确切的依据。关于孔子故宅在曲阜孔庙中的位置, 清代康熙帝在礼祀孔庙时曾对臣下加以询问: “问庙基广阔, 何处是先师故宅? 毓圻奏曰: ‘皇上所御讲筵之后有鲁壁遗址, 乃先师燕居之所。’”^⑤由此也可以看出, 孔子故宅在现存孔庙中, 仅仅是区区一角之地。

西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 在距孔子去世 280 余年之后, 汉高祖刘邦作为最高统治者第一次拜谒了孔子的故宅, “十一月, 行自淮南还。过鲁, 以太牢祠孔子。”^⑥汉成帝(公元前 32 年—前 7 年)时人梅福曾上书成帝, 请求给予孔子以敕封: “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 而况圣人, ……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 孔氏子孙不免编户, 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 非皇天之意也。”^⑦梅福赖以请封孔子的主要依据是, 孔子是殷汤的后裔, 成王认为其事久远, “其语不经……终不见纳”^⑧, 后来才勉强将孔子封为“殷绍嘉公”。^⑨由此可知, 汉时在孔子的故乡确有孔子之庙, 但其奉祀仅仅是民间性的行为, 与一般的家庙无大差异(所谓“匹夫之祀”者是也)。但自汉武帝时代, 由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 已渐渐被统治者所采纳。董仲舒第一次将孔子称为“素王”^⑩, 也为后世将孔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做了铺垫。汉平帝元始元年(1 年)6 月: “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 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 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⑪这可以说是第二次对孔子的敕封, 其封号已比此前之“殷绍嘉公”为高, 但在这次敕封中, 显然周公旦及其后人被放在比孔子及其后裔地位更高的位置上。

东汉初建武五年(29 年)10 月, 汉光武帝刘秀曾“幸鲁, 使大司空祠孔子。”^⑫建武十四年(38 年)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⑬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 年)3 月, “帝东巡, 过鲁, 幸孔子宅, 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 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帝自制五经要说章句。”^⑭由此可知, 东汉时仍以孔子宅为祀孔之庙, 但祭祀的范围已经由孔子而扩展到他的 72 位弟子。值得注意的是, 这时的孔子宅(庙)中似乎已经出现了除祭祀之庙堂而外的“讲堂”建筑。据史料, 阙里讲堂自西汉末东汉初已经存在^⑮, 说明汉代时的孔庙已经有了扩展。汉章帝元和二年(85 年), 帝曾“进幸鲁, 祠东海恭王陵。庚寅, 祠孔子于阙里, 及七十二弟子, 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⑯而汉桓帝时(147—167 年), 曾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 画孔子像于壁。^⑰说明东汉时, 对孔子的祭祀并不十分隆重, 有时甚至会将孔子附于老子庙中。东汉延光三年(124 年), 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 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 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⑱

但是, 有汉一代是否对阙里孔庙的建造有所建树, 从史料中似乎无从发现。由三国魏明帝景初元年(237 年)鲁相曾上言: “汉旧立孔子庙, 褒成侯岁时奉祠, 辟雍行礼, 必祭

先师,王家出谷,春秋祭祀。今宗圣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礼,宜给牲牢,长吏奉祀,尊为贵神。”^①可知,汉代已经为孔子立庙(是因宅立庙,还是敕令建庙,尚未可知),祭祀行为也已经开始国家化。

汉末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有诏:“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羨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②其结果是“修复旧堂,丰其葺宇,莘莘学徒,爰居爰处。”^③这也许是孔庙建筑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官方性质的维修与扩建活动,但其扩建的目的,是为了“广为室屋,以居学者”,并不是对孔庙本身的扩建。

魏少帝齐王正始五年(244年),“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④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325年),诏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⑤从两汉至魏晋数百年间,对于孔子的祠祀渐渐正规化,且国家化了。

南北朝时,曲阜孔庙已经初见规模,这从孔子旧庭中的柏树中可见端倪:“鲁郡孔子旧庭有柏树二十四株,经历汉、晋,其大连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义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叹息。”^⑥若以其庭中有连抱柏树20余株,则其庭院的规模也一定相当宏大。这说明,自孔子没后,到北魏时,其间的700年间,由原本简陋为3间屋舍的孔子宅,到内设讲堂、庭院中植有柏树数10棵,孔庙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随着孔子威望的日益增高,孔庙的基址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之中。

据《宋书》,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曾遣臣奉表:

路经阙里,过观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既达京辇,表求兴复圣祀,修建讲学。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下兖州鲁郡,准旧营饰。故尚书令谢石令臣所须列上,又出家布,薄助兴立。

说明南北朝时的孔庙建筑已经倾颓沦废,而晋孝武帝于太元十四年(389年)对其进行了“营饰”。而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⑦这可能是为孔庙特设“洒扫户”之开始,这一由国家特别安排为孔庙设立洒扫护理人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4月,又“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垆,更建碑铭,褒扬圣德。”^⑧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迁都于邺,以仲旋为营构匠作,进号卫大将军。出除车骑大将军、兖州刺史。仲旋以孔子庙墙宇颇有颓毁,遂修改焉。”^⑨这两次都是由国家对孔庙及孔林开展的修缮及完善工作。这时的孔庙,其建筑规模恐还不甚大,这一点由《魏书·地形志》中对鲁地前代重要遗迹的排列中略可看出:“鲁(二汉,晋属。有牛首亭、五父衢、尼丘山、房山、鲁城、叔梁纥庙、孔子墓、庙、沂水、泗水、季武子台、颜母祠、鲁昭公台、伯禽冢、鲁文公冢、鲁恭王陵、宰我冢、儿宽碑。)”^⑩这时曲阜的孔子墓与庙,只是诸多前代遗迹中的一个,并不显得特别突出。而后世渐渐纳入孔庙建筑群中的祭祀其父的叔梁纥庙与其母的颜母祠,都还是独立于孔庙之外的建筑物。

①文献[13],卷24,魏书二十四:552

②文献[13],卷2,魏书二,文帝纪第二:66

③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七,曹植:“魏制命宗圣侯奉家祀碑”,黄初元年。

④文献[14],卷4,三少帝纪第四:101

⑤文献[15],卷19:339

⑥文献[16],卷61:968,另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⑦文献[14],卷7上:82

⑧文献[14]:106

⑨文献[14],卷36:508

⑩据文献[9],卷25,“沂水出鲁城东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颜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东一十里有颜母庙。”:341

⑪文献[9],卷106中,《地形志》中:2520,中华书局

二 阙里孔庙建筑之增扩

南北朝时代晚期,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但对孔子的崇奉,仍然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北魏正光二年(521年)“二月,车驾幸国子学,讲《孝经》。三月庚午,幸国子学,祠孔子,以颜回配。”^①北齐天保元年(550年)“六月辛巳,诏改封崇圣侯孔长为恭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祀。并下鲁郡,以时修葺庙宇。”^②北周大象二年(580年),“诏进封孔子为邹国公,邑数准旧,并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③东魏兴和元年(539年),兖州刺史李瑋曾修孔子庙,“乃命工人修建容像”。^④隋大业四年(608年),诏称孔子为“先师尼父,……蕴兹素王,……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⑤唐代帝王在着力提倡释、老之术的同时,也对儒学加以了特别的关注。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⑥武德七年(624年):“诏‘……州县及乡,并令置学。’丁酉,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学业者,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乃罢。”^⑦这场宫廷辩论的结论,我们虽然不很清楚,但其后孔子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却是不争的事实。武德九年曾下诏对孔庙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事见于唐虞世南碑:“乃命经营,惟新旧址,万雉斯建,百堵皆兴,揆日占星,式规大壮,凤鸞翥其特起,龙栊俨以临空,霞人绮寮,日晖丹槛,……”^⑧贞观二年(628年),左仆射房玄龄与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于是“乃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⑨更重要的是,开元二十七年(740年),孔子被加上了“文宣王”的封号,孔子在庙祀中一直作为周公陪衬的命运,也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二十七年,诏夫子既称先圣,可谥曰文宣王,……以其嗣为文宣公,任州长史,代代勿绝。先时,孔庙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贞观中,废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国子监、天下州县夫子始皆南向,以颜渊配。”^⑩

在这一过程中,自初唐以来,无论对曲阜孔庙,还是对各地州、县孔庙的建设,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

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诏^⑪:“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

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

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诏奠孔子为宣父,作庙于兖州,给户二十奉之。”

高宗咸亨元年(670年),“诏州、县皆营孔子庙。”

武后天授元年(690年),“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

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以奉岁祀,子孙世袭褒圣侯。”

睿宗太极元年(712年),“以兖州隆道公近祠户三十供洒扫,加赠颜回太子太师,曾参太子太保,皆配享。”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诏夫子既称先圣,可谥曰文宣王,……以其嗣为文宣公,任州长史,代代勿绝。”^⑫

代宗永泰二年(766年),“修国学祠堂成,……”^⑬

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因“日往月来,颇有倾摧之势”,而“命工庀事,饰旧如新,浹旬之间,其功乃就,门连归德,先分数仞之形;殿接灵光,重见独存之状。”^⑭

这一连串的举措,尤其是武德九年大规模维修,贞观十一年“作庙于兖州”,及咸通

①文献[17],卷4:75

②文献[17],卷7:121

③文献[17],卷10:194

④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七,“东魏兖州刺史李瑋修孔子庙碑”。

⑤文献[18],卷3,帝纪第三:42

⑥文献[19],卷1:6

⑦文献[19],卷24:584

⑧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七,虞世南:“唐勒撰孔子庙堂碑记”。

⑨文献[20],卷15,志第五:195

⑩文献[20],卷15,志第五:195

⑪文献[19],卷189上,疑与武德二年诏为同一次,史料记录有差。

⑫文献[20],卷15,志第五:195

⑬文献[20],卷15,志第五:186

⑭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七,贾防:“唐修文宣王庙记”。

十年的修缮,显然是继三国时魏“修起旧庙,……于其外广为室屋”之后由政府出面对曲阜孔庙开展的几次较大规模建设活动。然而,有唐一代在孔庙建设上的更大建树,似乎是在各地州、县孔庙的建造上。如贞观四年与咸亨元年两次下诏,要求各州、县皆营孔子庙。这样一个全国性建造孔庙的工程,使孔庙从其发祥地——鲁,走向了京城,也走向了全国各地。从此,对孔子的祭祀开始变得现地化。这一做法被唐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帝王的重要释奠礼仪多在京师孔庙。京师孔庙与国子监,及各地州县孔庙,与州学、县学,都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要工程。由于这一问题涉及过宽,不拟放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唐末五代仍然继续着唐代以来渐趋强化的尊孔、祀孔的趋势。如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帝幸曲阜县,谒孔子祠。……遂幸孔林,拜孔子墓。……仍敕兖州修葺孔子祠宇,墓侧禁樵采。”^①宋初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诏修曲阜孔子庙。^②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又诏“兖州增二千户守孔子坟。”^③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诏立曲阜县孔子庙学舍。”^④然而,唐、宋两代虽然堪称盛世,对孔子地位的提高与儒学的普及做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在孔庙建筑方面,则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京师及地方孔庙及学校的建设上,围绕曲阜孔庙见于记载的活动,除了谒拜、敕封外,主要是维修性质的。如果说有所扩展,也仅仅是在孔庙附近的学舍或守墓邑户的规模上。

据梁思成先生的研究,曲阜孔庙的大体完备是在宋、金之间。宋天禧二年(1018年),对曲阜孔庙有一次大规模的修缮,但事不见《宋史》与《续资治通鉴》。《山东通志》简单地记录了此事:“(天禧)二年诏葺孔子庙,赐文宣公家祭冕服。”^⑤梁先生引《曲阜县志》卷24所载其事曰:

……乃大扩圣庙旧制。建庙门三重,次书楼,次唐、宋碑亭各一,次仪门,此御赞殿,次杏坛,坛后正殿,又后为郕国夫人殿,殿东虎为泗水侯殿,西虎为沂水侯殿。正殿西虎门外为齐国公殿,其后为鲁国太夫人殿。正殿东虎门外曰燕申门,其内曰斋厅,厅后曰金丝堂,堂后则家庙,左则神厨。由斋厅而东南为客馆,直北曰袞封视事厅,厅后为恩庆堂,其东北隅曰双桂堂。凡增广殿庭廊庑三百十六间。^⑥

宋天禧年的修缮,不见于正史,也不见于曲阜现存的碑记。碑记中所存宋代修缮的记录,是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的“宋兖州文宣王庙碑铭并序”,其中有:

惟鲁之夫子庙堂,未加营葺,阙孰甚焉。况像设卑而不广,堂庑陋而毁颓,触目荒凉,荆棘勿剪,阶序有妨于函丈,室壁不可以藏书,既非大壮之规,但有岿然之势,倾圮寝久,民何所观。遂乃鼎新,规葺旧制,遣使星而蒞事,募梓匠以儆功,经之营之,厥功告就。观夫缭垣云矗,飞檐翼张,重门迺其洞开,层阙郁其特起,绮疏瞰野,朱槛凌虚。^⑦

但这次修缮与宋天禧二年的修缮,相差35年。显然,在宋以前,曲阜孔庙的规制还十分简陋。自宋初太平兴国与天禧年两次修缮,其规模初具,形制渐趋完备。但天禧年间的修缮,其规模若如此之大,似与其后金章宗明昌年间的修缮之记录,有所矛盾。

有史可察的对曲阜孔庙较大规模的扩建,应该是在金代。辽、金两代虽然是由少数民族立国,但在对孔子的尊崇上,并不亚于中原汉族王朝。辽初神册三年(918年)就曾下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⑧神册四年(919年)辽太祖又“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⑨显然,辽统治者在对待儒、释、道三者关系上,是将孔子与儒家放在较高地位上的。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似有过一次对曲阜孔庙的修复工程。而更大的修复重建工程是在后来的明昌年间。金明昌元年(1190年)“诏修曲阜孔子庙学。”^⑩明昌五年(1194年),金章宗与其辅臣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①文献[21],卷112,周书,太祖纪三:830

②文献[22],卷431,列传第109:6482

③文献[22],卷7,本纪第七,真宗二:81

④文献[22],卷7,本纪第七,真宗二:86

⑤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阙里志三——历代隆仪”

⑥文献[3]:52

⑦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七,吕蒙正:“宋兖州文宣王庙碑铭并序”。

⑧文献[23],卷1,本纪第一:7

⑨文献[23],卷2,本纪第二:8

⑩文献[24],卷9,本纪第九,章宗一:132

上问辅臣曰：“孔子庙诸处何如？”平章政事守贞曰：“诸县见议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饰字像甚严，道流次之，惟儒者于孔子庙最为天裂。”守贞曰：“儒者不能长居学校，非若僧道久处寺观。”上曰：“僧道以佛、老营利，故务在庄严阔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为观美也。”[●]

●文献[24]，卷10，本纪第十，章宗二：136

●文献[24]，卷10，本纪第十，章宗二：147

章宗认为僧道以佛、老营利，人多施利，故其寺观常建常新，而孔子之庙则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因此，孔庙的建设则更多地仰赖国家或地方政府。正是金章宗对曲阜孔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新修与扩建。金明昌六年(1195年)，工程告竣，“命兖州长官以曲阜新修庙告成于宣圣。”[●]“金敕有司增修曲阜宣圣王庙毕，赐衍圣公以下三献法服及登歌乐一部，仍送太常旧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备祭礼。”[●]从记载中之“新修”与“增修”等语可知，在这一次修建工程中，孔庙建筑应该是有明显扩展的。据《山东通志》：“(金)章宗明昌元年三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增拓旧制。……六年夏四月，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圣庙共毕，……七月，命兖州长官以曲阜新修庙告成于先圣。”[●]这一点还可以见于党怀英所撰“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文献[25]，卷154：2890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阙里志三——历代隆仪”。

仍命选择干臣，典领其役。役取于军，匠佣于民，不责急成，而责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于有制。凡为殿堂、廊庑、门亭、斋厨、黉舍，三百六十余楹。位序有次，像设有仪，表以杰阁，周以崇垣。……三分其役因旧，以全加葺者什居其一，而增创者倍之。盖经始于明昌二年春，逾年而土木基架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绘成。[●]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七，党怀英，“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以文中所言“凡为殿堂、廊庑、门亭、斋厨、黉舍，三百六十余楹”，当与现存孔庙的规模基本相当了。而由“三分其役因旧，以全加葺者什居其一，而增创者倍之。”可知，金代重修后的规模，比此前的规模至少应该扩大了一倍。但以其同碑中有“阙里祠宇弗治，矧其旧制隘且庳，乃诏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众役具举。梓人献技，役夫効功，隘者以宏，庳者以崇，崇焉有制，宏焉有法，即旧以新，增其什八。殖殖其正，翼翼其严。”[●]可以推知，原有的规模是比较庳陋狭窄的。而此次大规模的修复重建，增加的规模在50%（“而增创者倍之”）或80%（“即旧以新，增其什八”）。不知两种说法何以为确。而若以《曲阜县志》所记宋天禧二年的修缮，规模已经达到“殿庭廊庑三百十六间”，与金明昌年的增修扩建的记载大相径庭，则金人之所谓“增创者倍之”、“即旧以新，增其什八”的记述似错讹过甚。或者可以理解为，宋末时的曲阜孔庙曾因战争而遭到过大规模的破坏，其规制重归简陋，仅余宋天禧间规模之半，而金明昌时在此破败基础上，“增创者倍之”，才有“三百六十余楹”的规模，亦未可知。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七，党怀英，“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有关宋、金间这两次修建工程记载的矛盾，还不止这一处。再举“奎文阁”的例子。据《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六，“阙里之六——至圣庙”条，有“今奎文阁宋时所建”[●]语，而据同书卷十一之七，党怀英撰“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却为“又庙有层阁以备皮书，愿得赐名，揭诸其上，以观示四方，诏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怀英记其事。”而元初宪宗二年(1252年)杨奂所撰《东游记》中则有“次南奎文阁，章宗时创，明昌二年八月也，开州刺史高德裔监修”[●]的描述。据《金史》，高德裔为金章宗与宣宗时人，事情确然，又有党怀英碑记为证，则奎文阁初建于金代是比较可信的。而奎文阁恰是大成殿前最主要的建筑物，则金代时，对奎文阁以南诸殿阁、廊庑做较大规模的增扩，则是比较可能的事情。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六

●文献[26]：136

●文献[24]，卷14，本纪第十四，“宣宗上”：187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在山东、河北一带，有过一次大规模的蒙古兵祸，“时山东、河北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徐、邳、海数城仅存而已，河东县亦多焚毁。”[●]曲阜孔庙再一次遭到了较严重的焚毁。正因为如此，元初宪宗二年(1252年)杨奂《东游记》中所记载的曲阜孔庙，所余建筑似不为多：“……趋大中门而东，由庙宅过庙

学,自毓粹门之北入,斋厅在金丝堂南,燕申门之北,堂取鲁恭王事也。……班杏坛之下,痛庙貌焚毁,北向郚国夫人新殿绘像修谒,……坛南十步许,真宗御赞殿也,……贞祐火余物也,……次南奎文阁,章宗时创,明昌二年八月也,……东庀碑六,皆隶书;……西庀之碑八,隶书者四,余皆唐宋碑也,……”^①这时站在杏坛前,所能够看到的是“庙貌焚毁”的悲凉景象,唯大成门外的奎文阁,与大成殿西偏的金丝堂,及斋厅等尚存。在今大成殿的位置上,似乎是新建的郚国夫人殿。而据元人所撰《郚国夫人殿记》:“……前庙后寝,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阙里旧有郚国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于金,号称尤盛,贞祐之乱,扫地无余,……以兴废补弊为所务,经始于己酉(1249年)八月,落成于壬子(1252年)之七月。”^②故杨奂壬子年游曲阜孔庙时所见之“郚国夫人新殿”,正是这座新修的殿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郚国夫人殿,是“吾夫子之祀”的重要场所。这恰恰说明曲阜孔庙的规制,在元初还尚未定型。

●文献[26]: 136

●文献[26]: 143

金大定、明昌年间的修复、重建工程,当使曲阜孔庙的型制趋于完备,但《山东通志》中将时间顺序搞错了。据《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在金大定、明昌之修复重建后,“金贞祐之乱,庙貌尽毁,至是修复,制乃大备”。^③然而,此话仅说对了一半,贞祐(1213—1217年)在大定(1161—1189年)、明昌(1190—1196年)之后,故其语应该是:金大定、明昌之修复重建,制乃大备,然贞祐之乱,庙貌尽毁。所以,元初杨奂《东游记》中所见,实在已是一种劫后仅余的破败景象。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阙里志三——历代隆仪”

三 阙里孔庙建筑之定型

自元代以降,曲阜孔庙的建设,趋于定型,并逐渐完善。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敕修曲阜孔庙,并敕上都重建孔子庙。^④这时距离金代壬子年重修孔庙的时间近30年。据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翰林学士阎复所撰《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记录,大德二年始修,大德五年秋告成的曲阜孔庙:“殿矗重檐,亢以层基,缭以修廊,大成有门,配侑诸贤有所,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既迁,更塑郚国像于后寝。缔构坚贞,规模壮丽。大小以楹计者,百二十有六,费用以缗计者,十万有奇。”^⑤这一次所“修曲阜文宣王庙,庙殿七间,转角复檐重址,基高一丈有奇,内外皆石柱。外柱二十六,皆刻龙于上。神门五间,转角、周围亦皆石柱,基高一丈,悉用琉璃。沿里碾玉妆饰”^⑥,已经具备了今日所见曲阜孔庙大成殿的主要特征,如殿身为七间,重檐副阶,两重台基,副阶柱为石柱,前檐柱为盘龙柱,屋顶为琉璃瓦。但奇怪的是,这次重建的结果,仅有建筑126楹,似远比金代明昌年重修后的360余楹,在规模上要小很多。是统计之误,还是因计算方法上的差别而引起的误差,尚未可知。至顺三年(1332年),“诏修曲阜宣圣庙”。^⑦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诏修曲阜孔子庙。^⑧这次修缮的结果,见于至元五年翰林学士欧阳玄的《敕修曲阜宣圣庙碑》,但其记录之修缮时间始于至元元年(1335年)4月,终于至元二年(1336年)10月,新落成之孔庙“宫室之壮以宁神栖,楼阁之崇以虔宝训,周垣缭庀,重门层观,丹碧黝垭,制侔王居。”^⑨这里的“制侔王居”可以说是对曲阜孔庙规制的一个恰当解释。其主殿为殿身7间,副阶9间,坐落在有两重石雕栏杆的台基上,周围廊庀环绕,并用盘龙石柱,其制度等级,仅略低于天子之正衙。“王居”之制,可以说是奠定了曲阜孔庙规制的基调。

●文献[27],卷8,本纪第八,世祖二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七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27],卷22,本纪第二十二,文宗下: 216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七

回顾有元一代,曾三修曲阜孔庙,大约每30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工程。最后一次修缮,距离前一次修缮,仅6年时间。如此频繁地修缮孔庙,除了建筑本身的原因之

●文献[28],卷7,本纪第七,成祖三:60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28],卷15,本纪第十五,孝宗:114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28],卷50,志第二十六,礼四,至圣先师孔子庙祀:712

●文献[28],卷50,志第二十六,礼四,至圣先师孔子庙祀:712

●文献[28],卷50,志第二十六,礼四,至圣先师孔子庙祀:712

●文献[28],卷50,志第二十六,礼四,至圣先师孔子庙祀:714

●文献[12],卷19:370

●文献[29],卷3,本纪三,太宗本纪二:40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

外,也不排除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而元代重修,主殿大成殿内外皆用石柱,这与元大都宫殿正衙大明殿内外用石柱的做法一样,是元人所崇尚的结构形式。这一点由明以后重修大成殿,将内柱重新改为木柱的做法中,可以略窥一斑。

明代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即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并遣使诣曲阜致祭。洪武七年(1374年)敕修曲阜孔庙。时距元代最后一次修缮孔庙也在30余年左右。说明自元代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曲阜孔庙建筑进行修缮的频次。在洪武重修约40年之后,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再次诏修阙里孔子庙,永乐十五年(1417年)夏,重修孔子庙成。●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诏山东巡抚贾铨重修阙里先圣庙。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重修工程竣工。●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6月,阙里孔子庙灾●,这次灾害的后果十分严重,“无穷庙貌尊严,古今崇奉,比今遭回禄煨烬靡遗。”●弘治十三年(1500年)重建工程开始,“重建大成殿九间,殿前盘龙石柱,两翼及后檐俱镌花石柱。”●由现存遗构看,这里所说的9间,其实仍是殿身7间,副阶9间的规制,并没有比元代大成殿规制更高,应该还是因元代基座而建的。弘治十七年(1504年)正月,重修工程完成。

明嘉靖朝,围绕是否在孔庙中供奉孔子像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言:“孔子宜称先圣先师,不称王。祀宇宜称庙,不称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毁。笾豆用十,乐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号宜削,止称先贤先儒。”●嘉靖帝命翰林诸臣进行争议,有言易号毁像之不可的,却引发了帝怒谪官的结果。嘉靖帝亲自写了《正孔子祀典说》,为主张毁像削号者助威。诸臣会议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孔庙本身,如“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首先从国子监开始实施,如“制木为神主”,●以取代孔子塑像。这一毁像易主削号的举动,同时涉及了历史上诸多大儒的配祀问题,引发持久的争辩,其结果是“仅国学更置之,阙里庙廷及天下学宫未遑颁行也。”●这一插曲,也反映出了对自唐代以来,对孔子地位及孔庙祭祀等级日益抬高之趋势的一个反思或争论。

在嘉靖朝论辩以后,逮至万历己卯年(1579年),又有过一次重修工程。●但此事并不见于正史。自兹之后,及于明末,陷于内外交困中的明王朝,再也没有能力顾及对曲阜孔庙的大规模修缮工程。

有清一代的祀孔活动始于清帝入主中原之前的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遣官祭孔子”。●并于崇德五年(1641年)确定了每年对孔子行释奠礼的时间。崇德八年(1643年)再遣臣赴曲阜阙里祭告。●顺治十四年(1657年),曾修孔子庙,但不确知是京师孔庙,还是曲阜孔庙。康熙三十八年,曲阜孔庙重修完成,康熙御书《重修阙里圣庙碑文》。●雍正二年(1724年)6月,曲阜孔庙再次被火,“先师大成殿,以及两庑,俱被火灾。请出圣像、牌位。新建崇圣祠,幸得无恙。”●崇圣祠在大成殿东路北侧,雍正二年大火前新建,现尚存原构。雍正三年(1725年)8月,重修阙里孔庙的工程开始。

雍正间重修曲阜孔庙的工程,得到雍正帝的直接关注。工程一开始,雍正帝即下谕要求“文庙工程务期巍焕崇闳,坚致壮丽,纤悉完备,焕然一新。”●并下诏要求阙里孔庙大成殿改用黄瓦,因为“庙自明弘治十三年始用绿色琉璃瓦,今特改黄瓦,由内厂监造,运赴曲阜。”●并御书“大成殿”匾额。此次重修工程,包括了重修同时被大火焚毁的康熙御书碑亭;奎文阁左右增建作为执事人员斋宿之所的值房;在大成门内“复设二十四戟”;将棂星门石坊上原镌“宣圣庙”额,改为“至圣庙”额;将奎文阁前之“恭同门”,改为“同文门”;将大成殿东路南侧之“诗礼堂”前的“燕申门”,改为“承圣门”。雍正帝还要求“将殿庑规制,以至祭器仪物,悉绘图呈览,指授修制。”●按照雍正帝的上谕,“阙里文庙依仿帝王宫

殿之制,规模宏焕,视昔有加,……朕虽未曾亲至其地,而筹画指授,寤寐瞻仰之诚,无刻不在尼防洙泗间也。”^⑥由此,也可以知道,这一次的重修工程,是直接由清帝运筹指授的,其规制依仿帝王之宫。在工程即将竣工之际,雍正还为大成殿内、外御书了“万世师表”与“生民未有”匾额,并书写了对联,并为原来没有题额的大门、二门题写了匾额,大门为“圣时门”,二门为“弘道门”。

雍正八年(1730年)工程告竣。这一次重修工程,最终确定了现存曲阜孔庙的形式、格局与门殿题额。之后,又对孔林进行了修缮,将孔林享殿三间,“照阙里寝庙之制,用黄瓦镶砌屋脊,以表仪典。”^⑦雍正以后,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修山东阙里至圣孔子林、庙。”^⑧这一次修缮的主要工程似在孔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5月,“修曲阜孔子庙”。^⑨这一次修缮,当是延续中国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对曲阜孔庙的维修工程。从现存孔庙遗构来看,这次修缮仅仅是局部的维修,没有大规模的改建工程,更没有触及既有的庙殿规制。因此,可以说现存孔庙仍然保持着雍正八年重修后的基本格局与面貌。

四 阙里孔庙建筑之型制

曲阜孔庙的最终型制,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元、明、清三代逐渐确立并完善的。对于孔子的祭祀释奠,虽然古已有之,但其礼仪、规制一直处在变动中。如三国曹魏时,是在京师辟雍中释奠孔子,至南北朝元魏时,才为孔子独立设庙。唐武德时,开始在京师国子监中立孔子庙。但当时的做法是,为周公与孔子各自立庙。并封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配祀。唐时房玄龄对这一做法提出了疑义,认为“周公孔子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允请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渊配。”^⑩并于太宗贞观四年开始,在地方郡县设立文庙,此为地方庙学之始。高宗永徽中,又恢复了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的作法,至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将周公的祭祀移到了周武王的庙堂中,作为武王的配祀,而复尊孔子为先圣。乾封三年,高宗封禅泰山时幸曲阜祠孔子,追封孔子为“大师”,“庶年代虽远,式范令图,景业惟新,仪型茂实;其庙宇制度卑陋,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⑪可见,唐时孔子的在国家祭祀谱系中的地位仍然较低,其祭祀官仅为三品,并以较低等级的“少牢”致祭。但已经开始关注孔庙的“式范”、“仪型”。

唐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帝亲诣曲阜孔子宅奠祭,并遣官以太牢礼祭祀孔子墓。这说明当时的曲阜孔子庙(宅),还十分卑陋,无以提供较高规格的祭祀条件。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这是对孔子敕封以“王”号之始。也可以说是对孔子祭祀,及孔庙规制加以等级提升之始。正是开元二十七年改变了以往以周公为主祀,孔子为配祀的“仪型”,将孔子升在主祀之位:“昔周公南面,夫子西面,今位既有殊,岂宜依旧,宜补其墮典,永作常式,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县学,夫子南面坐,十哲东西行列,……敕两京及兖州旧宅庙像,改服衮冕,乐用宫悬,舞用八佾,……给曲阜林庙百户洒扫。”^⑫也就是说,从唐开元二十七年开始,孔子才作为面南而坐的正位,而受到天下人的礼祀。这也为后世的孔庙建筑空间布局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周太祖入兖州谒夫子庙时,以帝王之身而礼拜孔子,时随行近臣认为天子不当拜,周太祖说:“夫子,圣人也,百王取则,安得不拜。”^⑬并诏修曲阜祠庙。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诏祭文宣王庙,立十六戟于庙门,用正一品礼,……

⑥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

⑦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

⑧文献[29],卷18,本纪十八,“宣宗本纪二”:472

⑨文献[29],卷24,本纪二十四,“德宗本纪二”:689

⑩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⑪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⑫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⑬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汉语大辞典》:176引《说文》:“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1763,“镇圭之属”条引:《周礼·春官·天府》:“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镇圭为王者之圭。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三

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由此可见,殿前两庑的出现,是与释奠配祀的礼仪有所关联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诏复曲阜县文宣王家”,并“诏大将作恢敞儒宫。”●这可以说是开启了对曲阜孔庙规模、型制大加扩张之做法之始。淳化四年(993年),“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则说明“讲论堂”在庙学建筑中曾居有重要位置。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诏追封孔子父叔梁纥为齐国公,母颜氏为鲁国夫人,……又追封圣配开官氏为郚国夫人”,并“亲巡鲁甸,永怀宣圣之德,躬造阙里之庭。”●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诏追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这样一些追封事件,及“躬造阙里之庭”的愿望,为曲阜孔庙规模的扩大与制度的完备,奠定了基础。如后世曲阜孔庙,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都将与孔子有血缘关系人物的种种封号,如叔梁纥殿、颜母殿、郚国夫人殿,及泗水侯殿、沂水侯殿等,作为曲阜孔庙中的主要祭祀建筑之一。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又在孔子的封号前加了“至圣”二字,改封为“至圣文宣王”。庆历四年(1044年)将曲阜孔庙的洒扫户增加到50人。至和二年(1055年),敕封孔子嫡传后裔为“衍圣公”。●这一对孔子后人的最高封号,自宋仁宗年间始封后,经过了历史上数次反复地改封(如改为“奉圣公”等)与恢复,最终一直沿用了下来。崇宁四年(1105年),“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这是将祭祀孔子的主殿称为“大成殿”之始。元年(1107年),下令禁止在孔林中樵采林木,并立赏钱10贯,以奖励那些“告捉”之人。同年,还采用《周礼》王制,使孔庙文宣王“改执镇圭”●,并将孔庙前象征身份等级的庙门立戟,由原来的“十六戟”改为“增立二十四戟,如王者制”●。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又将对孔子的释典改为“大祀”(宁宗庆元中又改回为“中祀”),这些都将孔庙祭祀的等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宗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这显然是承袭了宋代以王者之仪释奠孔子的做法,并在宋代“至圣文宣王”封号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大成”,更加昭显了孔子的地位。在至顺元年(1330年)和至顺三年(1332年)又先后将齐国公叔梁纥加封为“启圣王”,将鲁国太夫人颜氏加封为“启圣王夫人”,而将郚国夫人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从而将孔子父母及配偶的地位抬高到了极致。这些都为将曲阜孔庙建筑的规制等同于王者之制,奠定了基础。

我们可以看一看孔庙建筑空间的构成,据《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六:

至圣庙(在鲁城内,本距曲阜县八里,明正德中从金事潘珍之请,环圣庙为城,迁县于此以卫之。)

按旧制:

圣庙二门,榜曰大中门,宋仁宗御笔也;

三门之后曰书楼,藏赐书之楼也(即今奎文阁);

楼后,御路东西两碑亭;

次仪门,门内御赞殿;

次杏坛,即讲堂遗址,汉明帝幸孔子宅,御此说经,后世因以为坛;

坛之后即正殿,殿榜乃宋仁宗御制飞白书也,徽宗崇宁二年诏殿名大成;

其后为郚国夫人殿;

殿东庑祀泗水侯,西庑祀沂水侯;

正殿廊西门外齐国公殿;

其后为鲁国太夫人殿；

次后为五贤堂(宋时所建),祀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

正殿廊东门外,曰斋厅,即宋真宗东封谒庙驻蹕之所(真宗回銮,次兖州,诏去其殿制,赐本宗为厅,族人遇祭,致斋于此,遂名为斋厅)；

斋厅之东门外,其南客馆,其北客位；

斋厅之后客堂,孔氏接见宾客之所,由客位东一门直北,曰袭封视事厅；

厅后恩庆堂,乃孔中丞道辅典乡郡时,会内外亲族之所。

堂之西,曰家庙；

堂之东北隅,曰双桂堂。孔氏舜亮、宗翰尝读书于此。皇祐元年同赐第,故名庙。

左为衍圣公第,第前为阙里坊,古阙里也。

庙创后鲁哀公十七年,汉、魏、唐、宋,代有修饰。至金皇统、大定间,制乃加备。

元至元丁卯(至元十四年丁丑 1277 年,二十四年丁亥 1287 年,丁卯只有泰定四年 1327 年?)大德戊戌(大德二年戊戌 1298 年)至元己卯(惠宗至元五年己卯,1339 年)

凡三修焉；明洪武初,奉诏重修。永乐十四年,又撤其旧而新之；

成化十九年,始广正殿为九间,规制益宏。

弘治十二年(1499 年)灾,奉诏重进(建?)；

嘉靖、隆庆以来,守臣屡加修葺。^①

如上所录之曲阜孔庙规制,当是元、明代时的“旧制”,以其将“大中门”称为“二门”看,其前仅有一门,这显然是早于现存孔庙的型制。而以前述元初杨奂《东游记》中“……趋大中门而东,由庙宅过庙学,自毓粹门之北入,斋厅在金丝堂南,燕申门之北,堂取鲁恭王事也”的记录,似与这里所记载的大中门为庙前之二门,可以横穿而过；斋厅在正殿(大成殿)廊东门外。但杨氏将大成殿西路的金丝堂与大成殿东路东庑门外的燕申门(今承圣门)在空间上与斋厅连为南北一线,说明杨奂在记录上也有误,这里不详究。但从庙中主要建筑之正殿大成殿来看,“其后为郛国夫人殿；殿东 庑祀泗水侯,西庑祀沂水侯；正殿廊西门外齐国公殿；其后为鲁国太夫人殿；次后为五贤堂,祀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来看,这时的主要建筑格局,基本上是按照封祀的名位设置的。其余附属建筑,仅为藏书楼(奎文阁)、斋厅、家庙之属。

另据《明史》,洪武十五年(1382 年)所建南京孔庙：“庙在学东,东西两庑,前大成门,门左右列戟二十四。门外东为牺牲厨,西为祭器库,又前为灵星门。”^②已经初步确立了孔庙的建筑,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为轴线,以东、西两庑为两翼,门外设厨、库等辅助建筑的基本格局。然而,由于最初的设置还比较狭促,洪武三十年(1397 年)又将南京孔庙进一步加以扩展：“三十年,以国学孔子庙隘,命工部改作,其制皆帝所规画。大成殿门各六楹,灵星门三(间?),东西庑七十六楹,神厨、库皆八楹,宰牲所六楹。”^③明初南京孔庙的规制,已经十分接近现存曲阜孔庙的建筑格局。其前设棂星门 3 开间,大成门为 5 开间(六楹),大成殿前两庑为各 37 开间^④(各三十八楹,共七十六楹)。这与现存曲阜孔庙前有 3 开间棂星门,5 开间大成门,东西两庑各 40 间的格局,已经十分接近。这说明初洪武帝亲自参与了孔庙建筑格局的“规画”。

这一“规画”直接影响了曲阜孔庙的格局,形成了如上描述的这样一个以大中门(二门)、三门(同文门)、书楼(奎文阁)、仪门(现已无存)为前导空间,以大成门、大成殿,及殿前两庑为核心,以其后郛国夫人殿,及殿前东西泗水侯、沂水侯两庑,形成的曲阜孔庙中路建筑；和正殿廊西门外依序排列的齐国公殿、鲁国太夫人殿、五贤堂(当在今启圣门

●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六

●文献[28],卷 50,志第二十六,礼四,至圣先师孔子庙祀: 710

●文献[28]: 711

●古人之“楹”,有时指开间数,有时指正面柱子数,故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两庑各 38 间;二是两庑各 38 柱,37 间。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楹”数似指柱子数,故为 37 间。

内);及正殿廊东门外依序排列的斋厅、客堂、恩庆堂(当在今承圣门内),构成了元、明曲阜孔庙的基本格局。而这一格局,恰恰是自唐、宋、元以来不断提高与增加的对孔子及孔子的亲眷和弟子所施予的种种封祀名号以建筑空间形式加以展示的结果。

清代康、雍大修重建以来,最终确定了今日所存曲阜孔庙的格局:

至国朝康熙二十八年,奉诏重修。

雍正二年六月复灾,奉诏大加鼎建,告成,規制如左:

金声玉振坊,在棧星门南。

棧星门,在金声玉振坊北,门前有水环流如带。

太和元气坊,在棧星门北;左侧为德侔天地坊,右侧为道贯古今坊。

至圣庙坊,在太和元气坊北。

圣时门,在至圣庙坊北,三间环洞,如城门制,左右各有雁翅墙。

泮池,在圣时门北,上有三墙;池南左侧为快靚门,右侧为仰高门;每门三间,东西对峙,各通官道。

弘道门,在泮池北,五间,高一丈七尺,面阔五丈四尺,进深二丈八尺,四围俱石柱,左右皆有掖门。

大中门,在弘道门北,五间,高二丈四尺,面阔六丈四尺,进深二丈四尺,左右各有掖门。

同文门,在弘道门北,五间,高二丈四尺,面阔六丈四尺,进深二丈四尺,左右各有掖门。

奎文阁,在同文门北,七间,三檐,高七丈四尺,面阔九丈,进深五丈五尺,前面擎檐俱石柱,阁两傍各有便门三间,门左右各有屋十五间。

左侧为宗子斋宿所,门一,正斋房五间,西向南北房各三间。

右侧为有司斋宿所,门一,正斋房五间。

大成门,在奎文阁北,五间,高二丈八尺,面阔六丈五尺,进深三丈五尺,前后擎檐,中间盘龙石柱,两傍鎏花石柱,诏用黄琉璃瓦,檐下设罍,列戟二十四枝;恭悬御制御书对联于明间中柱;

两掖门,左为金声门,右为玉振门;与大成门并南向,每门各三间。

左侧为毓粹门,右侧为观德门,在奎文阁北,大成门南,东西对峙,各通官道;中列碑亭一十二座。奎文阁后,八座;大成门前,四座。有新建圣祖皇帝御制碑亭。

皇上御制碑亭。

杏坛,在大成门北,盖□色琉璃瓦,坛前东南有圣袿遗迹。

大成殿,在杏坛北,九间,两檐,高七丈八尺,面阔一十三丈五尺,进深八丈四尺,前面用盘龙石柱,两山及后檐俱用鎏花石柱,诏盖黄琉璃瓦,檐下设罍。(正殿设至圣孔子像,南向;四配、十一哲像,分侍左右。至圣殿内天花枋上恭悬圣祖仁皇帝御书匾额,殿外门枋上,恭悬皇上御书匾额,殿外正间明枋恭悬御书对联。)

两庑,在大成殿左右,各五十间^①,高二丈三尺;每庑阔五十五丈三尺,深二丈五尺,盖□镶砌黄瓦。(东庑祀先贤蘧瑗^②以下六十二位;西庑祀先贤林放^③以下六十三位。)

寝殿,在大成殿北,七间,附檐,高六丈四尺,面阔九丈五尺,进深五丈,四围擎檐,俱用鎏花石柱,盖□镶砌黄瓦,檐下设罍。

两配殿,在寝殿左右如两庑制(正殿祀圣配郚国夫人。左殿祀洙水侯伯鱼,右殿祀沂国公子思)。

●这里的“五十间”当是“四十间”之误。现存两庑为40间,在雍正八年至清末没有对两庑进行大规模重建的记录,也没有可以设置50间庑房的空间。

●春秋时卫国大夫蘧(音:qu)瑗,字伯玉,见《汉语大辞典》:1385。据《三家注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如文翁所记,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後人所以见增益,於今殆不可考。”

●《汉语大辞典》:第490页引《广韵·侵韵》:“林,姓。《风俗通》曰:林放之后。”林放为孔子弟子,参见前一条注释。

圣迹殿，在寝殿北，门一间，殿五间，高三丈八尺六寸，面阔九丈六尺一寸，进深三丈三尺。殿内石刻至圣事迹。

崇圣祠，在大成殿东。

承圣门，与大成门并列南向，在金声门左，三间，高二丈，面阔三丈一尺，进深一丈三尺。

诗礼堂，在承圣门北，五间，高二丈八尺，阔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堂西北，为孔宅故井、为鲁壁。

堂前左侧为礼器库，九间，高一丈六尺，阔八丈五尺。

崇圣祠，在诗礼堂北，祠门，正一旁二，祠五间，高三丈，面阔七丈二尺，进深三丈六尺，前面擎檐，中二根盘龙石柱，旁四根绣花石柱。（祠内祀至圣先世五王。）

家庙，在崇圣祠北，五间，为孔氏家祠。

启圣祠，在大成殿西。

启圣门，与大成门并列南向，在五振门右，三间，与承圣门等。

金丝堂，在启圣门北，三间，高二丈八尺，面阔七丈五尺，进深四丈二尺。

堂前右侧为乐器库，九间，高深如礼器库。

启圣殿，在金丝堂北，祠门，正一旁二，殿五间，高三丈，阔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前面擎檐，中二根盘龙石柱，旁四根绣花石柱。（殿内祀启圣王，先贤颜无繇^①以下分侍左右）。

启圣寝殿，在启圣殿北，三间。（殿内祀启圣王夫人。）

圣迹殿垣左有后土祠，在家庙北，门一，祠三间。右有望瘞所，在启圣寝殿北，门一；东北有神庖，门一，神庖正室五间，左右厢各五间。西北有神厨，如神庖制，共屋十五间。角楼四座，庙垣四周，二座在大中门左、右；二座在后垣艮、乾二隅。楼高二丈，面阔二丈三尺，进深二丈三尺。^②

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如上之格局，显然是雍正八年刚刚大修重建后的规制。如奎文阁之北“列碑亭一十二座”，其中不包括乾隆三十年的碑亭。文中在“有新建圣祖皇帝御制碑亭”之后所云“皇上御制碑亭”之“皇上”，显然是指雍正帝。而雍正重修后的格局，已经将明代一些规制及殿名改变。如大成殿后之寝殿，当为元、明时之郕国夫人殿；其前两庑分别为元、明时之泗水侯殿与沂水侯殿，但雍正后已与正殿前两庑联为一体。正殿西之启圣殿，当为元、明时“正殿廊西门外齐国公殿”；其后之寝殿即为元、明时“鲁国太夫人殿”。而原在“鲁国太夫人殿”之后的“五贤堂”，则已不存，而将对五贤（即“至圣先世五王”）的祭祀地点，改在正殿之东的崇圣祠。这里是否是元、明之斋厅、客堂、恩庆堂之位，尚不十分清楚。此外，元、明时之奎文阁后的“仪门”，已被“大成门”所取代，而仪门与杏坛之间的御赞殿已不存。由此也可以看出，由元、明，至清雍正间，曲阜孔庙建筑的规制仍然处在变化之中。

*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在这里做一些讨论。一是“杏坛”的问题；二是曲阜城的问题。上文所引明代阙里孔庙的记录中，关于杏坛是这样描述的，“次杏坛，即讲堂遗址，汉明帝幸孔子宅，御此说经，后世因以为坛。”也就是说，作为孔子讲道之象征的“杏坛”，其原址是

①颜无繇，颜回之父。据文献[5]，索隐家语云：“颜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少孔子六岁。”见文献[5]，卷67，仲尼弟子列传第七：1042

②文献[7]，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六

●文献[30], 杂篇, 渔夫三十一: 119

●文献[31], 卷 31

●文献[31], 卷 31

●文献[32], 祠庙类, “曲阜孔庙”条: 165

汉代孔庙(宅)之讲堂的所在。其实,遍查《史记》、《汉书》及《论语》,并没有出现与孔子有关的“杏坛”一词。将杏坛与孔子扯到一起的是庄子。《庄子·杂篇》中有“孔子游乎缙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①之语。清人顾炎武已经对杏坛之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并指出:“《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既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坛,乃宋乾兴间,四十五代孙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石为坛,环植以杏,故取杏坛之名名之耳。”^②由此可知,以杏坛代讲堂,是宋乾兴间(1022—1023年)的事情。以杏坛表征孔子布道之所,与讲堂之原意相合,且比功能性之讲堂更具空间象征意味,倒也是孔门之后在建筑上的一个创新。

前所引文中还有:“在鲁城内,本距曲阜县八里,明正德中从佾事潘珍之请,环圣庙为城,迁县于此以卫之。”这里说出了孔庙与曲阜的关系。孔庙原在阙里,因春秋时鲁公之南门两观而名之。据《水经注》:“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又汉鲁恭王欲扩宫室而坏孔子宅。故孔庙是在鲁之宫室的左近。顾炎武引《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③这里的定公,是指鲁定公。鲁定公二年是公元前508年,那时孔子44岁。金、元时阙里孔庙已经颇具规模。故明正德间(1506—1521年)将原距阙里有8里之远的曲阜县城迁移到了阙里。因而也形成了以孔庙为中心的特殊城市格局。这里引用清人徐珂的《清稗类钞》中一段有趣的话,聊作对曲阜城空间特征的一个总结:

曲阜全城面积,孔庙殆占其三分一以上,尝戏摹其形,恰如一“面”字。圣庙之南,直抵城南门,其北直抵城北门。东西数仞之墙,则“面”字中心两直笔也。“面”字之首画为城北门外之孔林。自孔林至北门,为极长之辇道,苍松夹路,匝地成阴,则“面”字之第二撇笔也。^④

我们知道,北方州、县城市,多以“十字”形平面格局布置,略似隋唐长安、洛阳城内之里坊内的空间格局。与梁思成先生所说阙里孔庙这样一座延续两千余年之久,反复重建,不断展拓的建筑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孤例一样,曲阜县城这种“面”字形的城市布局,在中国县城空间格局中,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附表:孔庙修建历史略表

(含阙里、京师、州县学孔庙及曲阜孔林历代修建略况)

朝代	年代	公元	文献记载	备注
周	敬王四十二年	公元前478年	周敬王四十二年,鲁哀公谏孔子曰“尼父”(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	
三国	魏文帝黄初元年	220年	诏以孔羨为“宗圣侯”,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宫室,以居学者	
南北朝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	426年	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子配	京师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	442年	诏袭孔子后修先圣庙,下鲁郡守卫茔墓诏……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建,依旧给祠,宜令四时饗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教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而坟茔荒芜,荆棘弗剪。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种松柏六百株,封孔鲜为崇圣侯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	454年	令建孔子庙,给祭秩……庙制同诸侯之礼	非阙里

续表

朝代	年代	公元	文献记载	备注
南北朝	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	472年	修严孔子庙祀	不详
	南齐武帝永明七年	489年	建孔子庙,给祭秩,复奉圣爵	非阙里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	489年	诏立孔子庙于京师	京师
	太和十九年	495年	车驾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围栽柏,修饰坟墓,更建碑铭,褒扬圣德	
	南梁武帝天监四年	505年	正月诏立州郡学,六月建孔子庙	州郡建学之始
	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	541年	兖州刺史李瑋始建圣像雕塑,十子侍侧	塑像之始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	550年	诏奉孔渠为“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	
	梁敬帝太平二年	557年	诏求孔子后为“奉圣侯”,修庙荐秩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	580年	追封孔子为邹国公……邑数准旧……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改封孔渠为邹国公,食邑一千户	京师
陈后主至德三年	585年	释奠先圣,敕修葺庙宇	不详	
隋	隋文帝开皇初	581年后	赠孔子为“先师尼父”,制国子寺	京师
唐	唐高祖武德二年	619年	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子学,……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	京师
	武德九年	626年	封孔德伦为“褒圣侯”,重修孔子庙	不详
	太宗贞观元年	627年	罢祀周公,尊孔子为先圣	
	贞观四年	630年	诏州、县学皆立孔子庙	州县学建文庙之始
	贞观十一年	637年	尊孔子为“宣父”,作庙于兖州;给户二十以奉之	
	高宗乾封元年	666年	东封泰山,幸曲阜,祠孔子;追封太师,增修庙制	
	咸亨元年	670年	诏州、县皆营孔子庙	
	玄宗先天元年	712年	诏于兖州取侧近孔庙三十户,以供洒扫	
	开元二十七年	739年	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面,今位既有殊,岂宜依旧,补其堕典,永作常式,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县学,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行列侍……敕两京及兖州旧宅庙像,改服衮冕,乐用宫悬,舞用八佾,……给曲阜林庙百户洒扫	
五代	辽太祖神册三年	918年	诏建孔子庙……四年孔子庙告成,躬谒祭奠	京师

续表

朝代	年代	公元	文献记载	备注
五代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	931年	修复文宣王庙祀(时朱梁丧乱,庙祀废,至是复之)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敕兖州修葺祠庙,给复十户为洒扫户,饬禁樵采	
宋	宋太祖建隆元年	960年	诏祭文宣王庙,立十六戟于庙门,用正一品礼。增葺太学祠宇,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	东西庑之出现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	983年	重修阙里文宣王庙……诏大将作恢宏儒宫	
	淳化四年	993年	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又诏建国子监、文宣王庙于河南府	洛阳
	真宗景德三年	1006年	诏诸道州府军监修葺文宣王庙	诸州
	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	加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复敕修饰祠宇,给近便十户,以奉莹域……追封孔子父叔梁纥为“齐国公”,母颜氏为“鲁国夫人”……又追封圣配开官氏为“鄂国夫人”	
	大中祥符二年	1009年	诏立曲阜县孔子庙学舍,加先圣冕服,桓圭,从上公之制	
	大中祥符四年	1011年	诏州县立孔子庙	
	大中祥符五年	1012年	改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	
	仁宗庆历八年	1048年	诏圣父齐国公像易以九章之服,于圣殿后立庙奉安	
	至和二年	1055年	封孔子后为“衍圣公”。	
	神宗元丰元年	1078年	诏兖州修葺先圣祠	
	徽宗崇宁元年	1102年	诏追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	
	崇宁四年	1105年	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	
	大观元年	1107年	诏先圣墓立赏钱十贯,禁樵采林木,许人告捉	
	大观四年	1110年	制文宣王改执镇圭,庙门增立二十四戟,如王者制	
	金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	1182年	重修阙里孔子庙成
章宗明昌元年		1190年	诏修曲阜孔子庙,增拓旧制	
章宗明昌六年		1195年	命兖州长官以曲阜新修庙告成于先圣。凡为殿堂、廊庑、门亭、斋厨、黉舍,三百六十余楹。位序有次,像设有仪,表以杰阁,周以崇垣	制度大备
宣宗贞祐三年		1215年	迁汴,建宣圣庙于会朝门内,岁祀如仪。金贞祐之乱,庙貌尽毁	

续表

朝代	年代	公元	文献记载	备注
元	元太祖十年		平燕京,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行释奠礼	
	太宗五年		敕修孔子庙……八年三月复修孔子庙。九年令衍圣公孔元措修曲阜孔子庙,赐给其费。复给守庙一百户	
	世祖中统三年		修宣圣庙成	
	世祖至元四年	1267年	正月敕修曲阜宣圣庙,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成宗大德六年	1302年	修曲阜文宣王庙(庙殿七间),转角复檐,重址,基高一丈有奇,内外皆石柱,外柱二十六,皆刻龙于上,神门五间,转角周围亦皆石柱,基高一丈,悉用琉璃,沿里碾玉妆视 建孔子庙于京师	
	成宗大德十年	1306年	八月京师大都文宣王庙成,行释奠礼	京师
	成宗大德十一年	1307年	武宗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至顺元年	1330年	加封圣父为“启圣王”,圣母为“启圣王夫人”。……三年正月,加封圣配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	
	顺帝至元四年	1338年	正月诏修曲阜孔子庙	
明	明太祖洪武七年	1374年	二月修曲阜孔子庙	
	洪武十四年	1381年	四月建国子学于南京,定文庙之制,自先圣以下,罢塑像,改设木主	南京
	洪武三十年	1397年	十月重建国子监孔子庙成	南京
	成祖永乐十三年	1415年	正月诏修阙里孔子庙。……十五年夏重修孔子庙成。九月建碑于庙	
	英宗天顺八年	1464年	诏山东巡抚贾铨重修阙里先圣庙	
	宪宗成化元年	1465年	敕修阙里孔子庙	
	宪宗成化四年	1468年	修孔子庙成。六月帝撰文勒石于庙庭	
	孝宗弘治十二年	1499年	六月阙里孔子庙灾,……十三年二月重建孔子庙。(重建大成殿九间,殿前盘龙石柱,两翼及后檐俱镌花石柱。)	
	弘治十七年	1504年	正月阙里孔子庙成。(计工料银一十五万二千六百有奇。)	
清	清顺治二年	1645年	定文庙谥号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	
	康熙十四年	1675年	议改谥号为“至圣先师孔子”	
	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	御书《重修阙里圣庙碑》文:“……顾圣庙多历年所,丹雘改色,榱桷渐欹……特发内帑专官,往董其役,鳩工庀材,重加葺治,经始于辛未(1691年)之夏,竣于壬申(1692年)之秋,庙貌一新,观瞻以肃。”	

续表

朝代	年代	公元	文献记载	备注
清	雍正二年	1724年	六月初九日申时阙里圣庙灾,衍圣公孔传铎疏状以闻,奉上谕,据奏,先师大成殿以及两庑俱被火灾,请出圣像、牌位,新建崇圣祠,幸得无恙……计材料工,择日兴修,务期规制复旧,庙貌重新	
	雍正七年	1729年	又请复二十四戟于大成门内。棂星门石坊一座,旧镌宣圣庙,请改为至圣庙。奎文阁前之门曰恭同,诗礼堂前之门曰燕申,请遵幸鲁盛典,改恭同为同文,改燕申为承圣。 敕将殿庑规制,以至祭器、仪物。悉绘图呈览,指授修制。 上谕……年来遣官兴建阙里文庙,依仿帝王宫殿之制,规模弘焕,视昔有加,时时谕令监督……	
	雍正八年	1730年	圣庙棂星门、石坊以内,大门、二门,向无题额,应请御定嘉名,奉诏大门名为圣时门;二门名为弘道门。七月,大成殿报峻。 诏遣内府塑手,摹塑圣像衮冕,服色一如周制。十二月……题报修建圣庙正绩各工共享帑银一十五万七千六百九十六两有奇	
	雍正九年	1731年	五月修理先圣林园……奉旨孔林工程仍着修理阙里庙工之陈世倌、张体仁等,会同衍圣公孔传铎敬谨监修	
	雍正十年	1732年	题请将孔林享殿三间照阙里寝庙之制,用黄瓦镶砌屋脊,以表仪典,奉诏允行。……十一年……题报修理孔林各工共享帑银二万五千三百三三两有奇	
	道光十四年	1834年	五月……庚寅,修山东阙里至圣孔子林、庙	《清史稿》
	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	十一月……丁卯,建曲阜学堂,发内帑十万济工	《清史稿》
	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	五月……甲午,修曲阜孔子庙	《清史稿》

注:除特别注明者外,本表资料来源均来自清乾隆年间编纂之《山东通志》(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参考文献

- [1] 中国营造学社编辑.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北京: 中国营造学社, 1935—1945
- [2] 梁思成. 梁思成文集(二).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 [3] 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三).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 [4] 《史记》. 二十五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5] 《史记》(三家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6] 《汉书》. 二十五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7] 影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8] 《晋书》. 二十五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9]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10] 郑玄注,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 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六.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

- [11]《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2](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3]《裴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4]《魏书》.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5]《晋书》.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6]《宋书》.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7]《北史》.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8]《隋书》.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9]《旧唐书》.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0]《新唐书》.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1]《旧五代史》.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2]《宋史》.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3]《辽史》.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4]《金史》.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5](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6]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27]《新元史》.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8]《明史》.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9]《清史稿》.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0]《庄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31](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32](清)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